

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增长极理论与政策研究

李 仁 贵

一、增长极思想的产生及其演变

增长极思想被当代各国用来解决各种不同的区域发展与规划问题,尤其被应用于落后地区和城市系统中。但作为原始涵义的增长极概念却与区域问题并无直接关系。这一概念是法国经济学家弗朗索瓦·佩鲁(Francqis Perroux)在50年代最先提出的。

增长极概念的出发点是抽象的经济空间,而非普通意义的地理空间。所谓经济空间,即“存在于经济元素之间的经济关系”^①。“有多少种确定经济科学目标抽象关系的组成结构,就可以在我国的学科中区分出多少种经济空间”^②。

广义地讲,经济空间可以分成三种主要类型:1.作为计划内容的经济空间;2.作为受力场的经济空间;3.作为匀质整体的经济空间。这几类空间中,与增长极概念关系最密切的是作为受力场的经济空间。这种空间“由若干中心(或极、焦点)所组成。各种离心力或向心力分别指向或发自这些中心。每一个中心的吸引力和排斥力都拥有一定的场,并与其它中心的场相互交汇。就此而言,任何普通意义上的空间都是由中心及传输各种力的场所组成”^③。佩鲁正是从这种受力场的中心确定了他的增长极:增长在这里出现并扩展到经济的其它部分中去。他写道:“增长并非同时出现在所有的地方:它以不同的强度首先出现于一些增长点或增长极上,然后通过不同的渠道向外扩散,并对整个经济产生不同的最终影响。”^④

佩鲁增长极思想更深一层的理论基础来源于他早期的“支配”(domination)概念。他与古典经济学家的均衡观点相反,认为在现实世界中经济要素的作用完全是在一种非均衡的条件下发生的。无论是大的经济单元之间还是小的经济单元之间都存在着不均等的相互影响,因而产生了对称的关系:一些经济单元支配着另一些经济单元。这种“一个单元对另一个单元所施加的不可逆或部分不可逆影响”^⑤被佩鲁称为支配效应。佩鲁特别重视“动态竞争”中支配效应的表现,如企业家进行创新,引入一种新产品,会迫使其他企业家改变其生产计划。在产业之间,则是一个产业引起另一个产业成本或价格的上升或下降,而本身并不在广度或深度上发生变化。据根这种支配效应概念,佩鲁进而引入了“推进型单元”(propulsive unit)概念。所谓推进型单元就是一种优势经济单元,它自身的增长与创新会诱导其它经济单元的增长。这样,如果一个拥有支配效应的经济以“受力场空间”形式出现,那么配置在这个场内的推进型单元即为“增长极”。佩鲁曾明确指出,增长极是“给定环境中的一个推进型

①②③ [法]弗朗索瓦·佩鲁:《经济空间:理论与应用》,《经济学季刊》总64期(1950年)。

④ [法]佩鲁:《略论增长极概念》,《应用经济学》1955年第1—2期,中译文见《经济学译丛》,1988年第9期。

⑤ [法]佩鲁:《优势效应与现代经济理论》,K·W·罗思柴尔德编:《经济学中的权力》,1950年,伦敦企鹅版。

单元”^①，它是“与周围环境相结合的一种推进型单元”^②。推进型单元并非象城市或区域这样的地理单元，而是诸如厂商或产业这样的经济单元。周围环境也是由一些与增长极密切相联的厂商或产业所组成的。

佩鲁的增长极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吸取了 J·熊彼特的创新与大单元作用的思想。象熊彼特一样，佩鲁认为企业家创新是经济进步最主要的因素，最具有创新性的经济活动发生于大的经济单元中，而这种经济单元往往也就是支配性单元。这样，大单元、创新与支配之间的紧密关系似乎成了佩鲁理论中最有意义的特征。

产业间相互关联和相互依存理论在增长极理论中也起着主要作用。不少学者把这种理论与熊彼特的发展是由创新波 (impulse of innovation) 所产生的理论一起看成是构筑佩鲁增长极理论的两大基石。就前者而言，一个新兴产业的设立能够刺激其它产业的创新与模仿；它的扩张能在某种环境条件下产生席托夫斯基 (T·Scitovsky) 式的“金融性外围经济”。这样，主导推进型产业的增长能使得前向、后向及旁侧联系的产业从外围经济中受益，并以主导推进型产业为中心进行聚集，从而形成产业综合体 (industrial complex)。现实中的增长极多以产业综合体的形式出现，所以在实际应用中一般更多地把佩鲁式增长极看成是“以主导推进型产业为中心，通过投入产出关系而紧密相联的大型产业群；这组产业群能比极以外的产业以更快的步伐创新和增长”^③。以后法国学派的发展就是从这种概念出发进行地理化和区域化的。

从以上佩鲁增长极思想的主要内容可以看出，佩鲁增长极理论的出发点是抽象的经济空间，它所关心的主要是增长极的结构特点，尤其是产业间的关联效应，但忽视了增长的空间方面，这是佩鲁增长极理论的最大缺陷。正如西方增长极问题评论家达温特 (D·F·Darwent) 所指出的，“既然所有的经济单元都必定有一个区位，既然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在什么地方’这个问题显得很突出，因而作为独立于地理空间的‘极’就提出了许多未能解决的复杂问题”^④。针对佩鲁增长极理论的这种缺陷，许多学者为把佩鲁的增长极概念转换到地理空间作出了很大的努力。而在这些尝试中首推法国另一名经济学家布代维尔 (J·R·Boudeville)。

布代维尔同佩鲁不带地理色彩的抽象经济空间概念相反，他强调经济空间的区域特征，认为“经济空间是经济变量在地理空间之中或之上的运用”^⑤。但象佩鲁一样，布代维尔也把经济空间区分为三种类型，即匀质空间、极化空间和计划空间；它们分别与佩鲁的三种经济空间类似。他还对空间和区域作了区分：区域以地理空间中连续的地域为特征，而空间并不如此。这样，区域也可以相应地划分成匀质区域、极化区域和计划区域。不难看出，与增长极由抽象空间转换成地理空间或区域背景有关的，无疑是极化空间和极化区域。对布代维尔来说，极化空间主要体现要素的相互依存性，这一概念与城市等级概念紧密相关，它特别适合于研究城市中心及其相互关系。这样，极化区域可以因此定义为地理空间中的连续异质地

① [法]佩鲁：《推进型区域与区域推进型厂商》，应用经济科学研究所备忘录，1961年3月。

② [法]佩鲁：《综合发展极分析与跨国投资》，载《第三世界论坛》第19期(1968)。

③ [英]H·W·里查逊和M·里查逊：《拉丁美洲增长中心战略有关问题》，《经济地理》杂志总51期(1974年)。

④ [美]达温特：《区域规划中的增长极与增长中心》，《环境与规划》1969年第1期。

⑤ [法]布代维尔：《区域经济规划问题》，爱丁堡大学1966年版。

域,这种区域中的不同部分通过围绕区域重心(城镇或极)而相互补充和相互依存。

通过向空间概念的转换,就把增长极概念同极化空间和极化区域中的“极”即城镇联系起来。但是,对作为地理空间中即地方化的增长极概念进行解释,似乎比佩鲁在抽象空间中的功能概念解释更为困难些,因为这里既涉及到地理空间的极化,又牵涉到功能空间的极化。因而可能随各人所强调的不同而相应地给出不同的定义,甚至同一作者随其侧重点不同也会对增长极有不同的理解。以此为基础,出现了对增长极概念的进一步解释。一些学者完全强调功能方面,如西班牙学者拉苏恩(J·R·Lasúen)认为:“增长极是围绕着特定的主导部门而发展起来的,通过投入产出关系而紧密联系的,并在地理上又聚集在一起的产业群;主导产业及其相关联的产业群可以比极地以外的产业以更快的步伐创新和发展。”^①这一概念与佩鲁的产业综合体概念接近,只不过强调了地理上的集中。与此相反,另一些学者则完全抛开佩鲁的产业或部门概念,基本上是从地理的角度来定义增长极的,甚至简单地把增长极看成一个城市,如美国学者尼科尔斯(V·Nichols)就主张,“增长极即经济活动的城市中心,它自身给增长的制约达到这样一种程度,以致增长能够扩散到该增长极所在的区域中,并最终扩散到所在国家欠发达的整个区域中。”^②这种思想在英美学者的文献中比较普遍。虽然这一概念距佩鲁的思想较远,然而具有更为广阔的应用前景,因为它便于与区位理论、区域增长理论等进行综合。

而在区域政策实践中,增长极概念又进一步复杂化了,它被用来描述各种政策干预措施。正如英国区域经济学家里查逊(H·W·Richardson)所说的,“工业基地的定点被描述为增长极的选址,小的农村服务中心被选作为农村地区的增长极,这在规模上是属于一个极端,而另一端则是促进上百万人口的大城市的发展,使之作为对首位城市的反磁力中心。”^③不仅如此,国与国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的差别也相当大,“每个国家的特定情况肯定是,人们不能在保加利亚给出与法国增长极相同的定义,瑞典被选为增长极或发展核的城市聚集体的最小规模也无法同意意大利等同,因为两个国家的人口密度根本不一样”^④。针对增长极多种定义混淆的情况,一些学者提出了分类的办法,如把尼科尔斯等人的地理增长极概念称为“增长中心”(growth centers),而“增长极”则指佩鲁的功能增长极概念;或者把“增长极”看成国家级的,把“增长中心”看成区域级的。但这些办法还不能消除混乱,尤其是随着区域增长极的许多亚种,如发展极(development pole)、增长点(growth point)、增长焦点(growth foci)、增长核(growth nuclei)、增长区(growth area)、核心区域(core region)等大量术语涌现,引起了更大的混乱。据此,一些学者干脆提出:当增长极应用到地理空间时,最好看作是一种区域经济加速增长和发展的条件理论。^⑤这可以避免在语义上作无休止的争论。

二、增长极理论的基本原理

由于对增长极涵义理解的不同或强调的重点不同,对区域增长极的运行机制就会有不同

① [西班牙]拉苏恩:《增长极概念概括》,1971年国际地理学会论文,巴西维多利亚。

② [美]尼科尔斯:《增长极:推进型效应估价》,伦敦《环境与规划》1969年第1期。

③ [英]里查逊:《区域与城市经济学》第7章,1978年伦敦企鹅版。

④ [法]R·佩雷拉:《增长极若干注释》,库克林斯基等编:《增长极与区域政策》,1972年海牙莫顿版。

⑤ 参见[比]皮林克:《区域极化发展理论》,应用经济科学研究所备忘录第15号,1965年3月。

的理解。尽管多数学者都把区域增长极理论建立在佩鲁的增长极思想之上,但对佩鲁的思想强调的角度不同。有些学者强调大型推进型产业对区域经济发展的推进作用;有些学者则强调城市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中心作用;还有一些学者则从创新的角度出发把大城市看成一国或一地区发展中的综合性创新发展中心。^①

直接由佩鲁的增长极分析而得出的区域增长极战略的基本思想最先由法国经济学家布代维尔作了系统的阐述^②;并且这种思想在后来以布代维尔、皮林克等为首的“法国学派”中一直居统治地位。同佩鲁一样,布代维尔特别强调推进型创新性产业在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在他看来,推进型产业可以对区域经济产生两种类型的增长效应:一是“里昂节夫乘数效应”,主要通过经济中所存在的产业之间的依存关系式而发生;二是“极化效应”,即推进型产业的建立或产品的增加会导致原区域中未曾配置的其它产业活动的出现。他提出,由推进型产业所诱导的经济活动,或是投入到推进型产业的“上游”(upstream)供应者,或是作为其产品的“下游”(downstream)使用者。这就是说,推进型产业可以对其它产业产生后向与前向联系效应,如水泥厂的建立既可以导致用于包装的纸袋厂的建立,也可以导致水泥材料工业的建立,并且这些后向与前向联系效应产业又可以通过区域内劳务和资本等要素的优化配置而得到补偿,从而随着整个产业的扩张使这一地区变得对投资更有吸引力,形成地区产业的累积增长。

由此可见,一旦布代维尔的分析被采纳,那么实现区域经济发展的问题可以划分为两部分:1.怎样保障区域中的推进型产业地方化;2.怎样保障配置推进型产业的地方不致于变成飞地。这就是要求推进型产业所诱导的增长、区域产业增长的乘数效应以至由增长所诱导的新兴产业也将限于区域之内。因此,布代维尔的分析确实提出了区域经济增长怎样才能出现的条件,也就是,如果在极化区域的节点或城市中心所配置的是推进型产业,而且这些产业所诱导的增长又包含在区域腹地之中,那么区域经济就可以通过推进型产业的扩张而增长。然而,布代维尔的分析也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就是推进型产业很难具有地方效用,其影响所及的地方往往在数百上千里之外,从而它更多地作为经济部门中的“极”而存在,很少成为区域中的“极”。事实上,这也就是增长极理论从抽象的经济空间中直接转换到地理空间中的最大缺陷。

针对布代维尔等人在分析区域增长极机理上的缺陷,英美一些学者另寻出路,转而强调城市等地理单元在区域发展中的作用,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们总是把城市当成区域增长极的重要原因。事实上,美国发展经济学家赫希曼(A·O·Hirshman)在其代表作《经济发展战略》一书中就曾谈到:“经济进步并不同时在每一处出现,而一旦出现,巨大的动力将会使得经济

① 关于佩鲁增长极学说在区域中的应用和发展,我国赴法留学生黄田华同志的观点比较可取。他在给笔者的信中主张把区域增长极理论划分成三个派:一是以法国、比利时等西欧经济学家为主的“法国学派”,主要观点是,在落后地区建立大型推进型工业,以此作为“增长极”来带动周围地区的经济发展;二是以美国、加拿大等北美经济学家为主的“美国学派”,其主要观点是,区域发展计划应围绕着城市之建立来进行,以使城市成为所在区域的“增长极”;三是以“联合国社会发展研究所”的一些经济学家为主的“联合国学派”,其主要观点是,“增长极”在区域发展中不应仅仅起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而起综合性的发展中心的作用。

② [法]布代维尔:《区域发展规划问题》爱丁堡大学1966年版。

增长围绕最初出发点集中”^①，对于任何具有较高收入水平的经济来说，它“必定而且将会在一个或几个区域实力中心首先发展；而在发展过程中，增长点或增长极出现的必要性意味着增长在国际间与区际间的不平等是增长本身不可避免的伴生物和条件”^②。这种观点可以基本上看作是佩鲁的增长极思想在区域中的直接翻版，这里所说的“增长极”或“增长点”基本上指的是极化空间或极化区域中的节点，即城市等地理单元。这样，“增长极”或“增长点”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就变成了城市中心对周围腹地的影响。这种分析也曾由赫希曼作过系统的阐述。为分析问题的方便，赫希曼把正在增长的区域(或城市中心)称为“北方”，把落后的区域(或周围腹地)称为“南方”，认为北方的增长对南方具有一系列直接的经济影响，有些有利，而有些不利，有利的影响称为“涓滴效应”(trickling-down effect)，而不利的影响称为“极化效应”(polarized effect)。^③涓滴效应主要是通过北方对南方的购买力或投资的增加而发生；但如果南方存在着隐蔽性失业，则南方边际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人均消费水平的提高也可以通过向北方的移民来实现。引起极化效应的原因部分是由于北方效率高的生产者可以通过竞争来使南方经济萎缩；而部分是由于选择性移民，从而“掠走了南方的关键技术人员、管理者以及更具有企业家精神的青年人”^④。因此，赫希曼认识到了“极”的增长也可以对当地产生负效应，即极化效应；而且“极”的累积集中性增长在起初阶段会扩大中心与外围之间的关系，或扩大增长性地区与落后性地区之间的关系。但是，他认为，从长期来看，地理上的涓滴效应将足以缩小区域之间的差异。因为增长的累积性集中并不会无限地进行，“一旦厂商的增长在国家领土的一部分生根，它显然会产生一种力量来作用于领土的其它部分”^⑤。这种趋势的不可避免性部分地是由于增长中的“极”会产生聚集不经济，从而促使工业的分散。在他看来，国家是一只新型的“看不见的手”，具有一种均衡机制，“如果通过涓滴效应与极化效应来表现的市场机制使得后者暂时占优势时，周密的经济政策将会起作用，并试图纠正这种情况。”^⑥

如果赫希曼的分析能够成立，就意味着工业投资在大城市的集中，除增加那里的增长动力外，也会对国家或区域的其它部分产生有利的涓滴效应，从而可以得出把增长极战略作为完成国家或区域经济增长目标的最佳手段的结论。然而并非所有的学者都同意这种看法。

在赫希曼之前，瑞典经济学家缪尔达尔(G·Myrdal)也曾作过类似的研究，其结论却很悲观。相应于赫希曼的“涓滴效应”与“极化效应”，他曾提出过“扩展效应”(Spread effect)与“回流效应”(backwash effect)，并且认为回流效应总是远大于扩展效应。“市场力所起的作用是趋向于扩大而不是缩小区域之间的差异”，^⑦一旦某一特定区域起初就比其它区域增长快，那么这个区域的“效率工资”(efficiency wage)就趋向于上升，结果它将比增长相对慢的区域获得更多的累积竞争利益。

后期区域增长极理论转而强调城市在一国或一地区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中所起的发展

①② [美]赫希曼：《经济发展战略》，耶鲁大学1958年版。

③ 虽然赫希曼与布代维尔都采用“极化效用”这一术语，但各自的含义不同。前者指极点周围腹地的不利影响，后者则指推进型单元诱导经济其它部分增长的过程。

④⑤⑥ [美]赫希曼：《经济发展战略》，耶鲁大学1958年版。

⑦ [瑞典]缪尔达尔：《经济理论与不发达区域》，1975年伦敦达克沃斯版。

中心或发展极(development pole)的作用,而不是只强调城市在区域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最先对城市在发展过程中采取综合观点的是美国学者兰帕德(Lampard)。他把现代化城市的发展看成是一种文化过程,通过这种过程可以使传统的价值观念、生活习惯、社会经济关系等都逐渐转换。城市在历史上是应经济、行政、防御、宗教等综合需求而出现的,现代城市的出现同现代技术与工业组织的出现有关。^①

然而,在把城市作为区域性的发展极时,多数学者所强调的是大城市及其体系在区域发展中所起的“创新”及其传播作用。佩鲁的增长极思想就曾给“创新”以很大的关注,但强调的主要是发生在厂商间或厂商之内的过程。而这里则相信类似的过程也可以通过城市等级而发生。

三、增长极政策与实践分析

增长极作为一种政策工具,早已在区域规划中得到了实际应用。众所周知的例子有法国八个平衡大城市的确立,意大利南部区的巴里-塔兰托-布林迪西工业综合体的组建,英国英格兰东北部和苏格兰中部增长区规划,美国阿巴拉契亚地区增长中心规划等;而在发展中国家的应用更是几乎遍及亚、非、拉美各大洲,如拉丁美洲次级增长中心的建立,非洲农村增长中心实践等。不少社会主义国家也曾接受了这一思想并付诸实践,如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等国的工业综合体规划就是应用这一思想的反映。一些学者认为,苏联在远东地区及南部大沙漠地带的开发也可以看作是这一思想的反映。增长极思潮影响之广,加上其理论本身不够完善,使得增长极政策与实践较之理论更为复杂。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面临的区域问题有:大都市地区的过分拥挤,萧条地区经济的停滞不前,落后地区经济状况的进一步恶化。针对这种情况,发达国家的增长极战略主要是解决以下几个问题:控制大都市地区的进一步集中,对衰退的老工业区实行产业结构的转换,对前资本主义占统治地位的地区实行现代化政策。解决第一个问题的最早的实例在法国。60年代中期,法国针对巴黎地区的过度膨胀问题,实行了一种以刺激八个主要省会中心创造平衡大城市为目标的政策,获得了很大成功。大巴黎区人口得到控制。1968—1975年,巴黎人口增长率为4.3%,而作为增长极的平衡大城市人口增长率为10.3%^②。在区域发展规划中应用得比较普遍的是萧条地区和落后地区的发展问题。例如意大利南部的开发。这片地区原是意大利最贫困的地区,为促进这一地区的发展,意大利政府于1965年作出了建立巴里-塔兰托-布林迪西增长极的决策;其目的是通过在这些地区提供较好的基础设施,以吸引布代维尔式的大型推进型产业,通过这些产业的发展带动地区其它产业的成长,以迅速改变这一地区的落后面貌。这一战略在意大利南部实施虽并不很成功,但至少为这一地区建立了不少现代化的企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那些地区的落后面貌。

在发展中国家,增长极战略也基本上应用于3个最主要的问题:落后地区的现代化战略、与自然资源开发相关的城市化问题以及对首位城市过度膨胀的控制。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落后地区的现代化主要是在落后地区建立中心城市,使之作为这类地区的增长中心或增长

^① (美)兰帕德:《经济发达地区的城市史》,《经济发展与文化变化》1968年第1期。

^② 参见于洪俊、宁越敏:《城市地理概论》,1983年安徽科技版第556页。

极。而这类城市又通常采取三种主要方式：1. 为农村服务的增长中心；2. 行政管理中心，通常为区域以至国家首府；3. 工业城市增长极，即拥有大规模推进型工业部门的城市中心。其中最为普遍的是第三种形式。这主要运用于亚洲、拉丁美洲等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落后地区开发。与地区自然资源开发相伴随的城市化问题，通常是在资源开发区建立起出口导向的城市，即把区域增长极的建立与区域出口基 (export base) 相联系。所谓出口基一般是指面向区外或国外的产业部门，它们的发展往往能对当地经济产生较大的产业关联效应，从而带动区域经济的发展。关于发展中国家首位城市过度膨胀的问题，往往是缺少从首位大城市过渡到小城市的中间环节。这种情况在战后独立的发展中国家比较普遍。为弥补这一缺陷，不少国家尤其是拉美国家采取了建立次级增长中心的办法，即通过选择若干具有发展潜力的小城市或地方集中投资，使其在一定年限内发展成为国家级中等城市，以完善城市体系。这样，大城市的革新就可以通过次级增长中心而逐级向下传递。

为了对增长极战略在各国的实践有一个简单、清晰的了解，并澄清人们易于产生的误解，不少学者提出了分类办法。其中由赫曼森 (T·Hermansen) 最早提出，并经加里森 (J·Garrison) 进一步整理的分类法比较可取。这种分类法由四个范畴所组成，各有自己的变量：1. 功能：发展政策、调整政策、发展兼调整政策；2. 层次：高级、次级、三级；3. 战略：主动型战略、被动型战略；4. 方式：增长极政策、增长点政策。^②

结 束 语

尽管增长极概念自弗朗索瓦·佩鲁提出后理论上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并在实践中得到空前的运用，然而增长极理论的基本思想是非常简单的，即“增长并非同时出现在所有的地方，它以不同的强度出现于一些增长点或增长极上，然后通过不同的渠道向外扩散，并对整个经济产生不同的最终影响。”^③ 这一思想是关于在空间领域 (无论是经济空间还是地理空间) 对经济发展不平衡这一事实的经验归纳和总结。而发展过程的原动力也倾向于经济活动的聚集，从这种意义上说，发展实质上呈极化状态。解释这种极化增长的机制似乎也很简单：在某一时刻在一给定地点所出现的经济活动中，由于利用了各种有利于经济成长的因素而产生累积的发展过程。随着对通信 (包括运输) 需求的增长，在技术上紧密相关的经济活动和人文活动趋向于在给定地点集中，从而形成经济的、工业的、第三次产业的地理团聚，并产生出增长极，现实中这相当于一个城市聚集体。增长极思想简单明确及直观解释增长现象的特征使其能在理论界和实践界迅速地传播。

当然，更重要的是增长极理论所强调的不均衡增长观念，它从两个主要方面打破了经济均衡的新古典传统：一方面，它反对平衡增长的自由主义观念 (这种观念只注意总产量和总收入的扩张条件)，而它所呈现的是一种包括能解释经济、社会和制度等方面结构变化的发展理论；另一方面，它通过引入空间变量而丰富了抽象的经济分析的内容，而这就连在那些把

① 参见〔挪〕赫曼森：《国家与区域发展中的发展极与发展中心》，载库克林斯基：《区域规划中的增长极与增长中心》，1972年海牙莫顿版。

② 〔英〕格拉森：《区域规划导论》第8章，伦敦牛津大学1982年版。

③ 〔法〕佩鲁：《略论增长极概念》，《应用经济学》1955年第1—2期。中译文见《经济学译丛》1988年第9期。

空间看成是产生生产要素差异原因的垄断竞争理论中都被忽视了。由于这样一些原因,使增长极理论更便于应用到国家或区域层次的发展规划之中。

我国目前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物力、财力资源都不充裕,我们决不能把有限的资金象撒胡椒面一样均匀地分布于全国,而必须选择条件比较好的地区作为“增长极”,并选择那些关联效应比较强的产业作为其主导产业。通过这些“极”的建设来带动地区或国家的经济发展。事实上,我国目前已有相当一些城市在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中起着增长极或发展极作用,尤其是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中心、中心城市林立,加上沿海一些开放城市在内,已成为我国东部沿海地区以至全国经济发展的“极”。因此,赵紫阳同志提出的加快沿海地区发展的战略思想是有见地的。当然,这并不是不发展内地和边远地区。内地和边远地区也已经形成了一批增长极或发展极。在加快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同时,可能而且应当重视内地和边远地区发展极或增长极的建设。这样可以更好地促进全国的经济起飞。

1988年6月修改

(作者工作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上接第80页)

国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的低水平难以抵销进口原料的价格影响。

由于连年巨额贸易逆差,最终导致美国沦为最大的国际净债务国。

70年代末期,美国大约一年有250亿美元的贸易逆差,但依靠海外投资收益就可以补足有余。1985年美国的贸易逆差已经高达1485亿美元,而海外投资收益已从1981年的341亿美元下降为1985年的247亿美元。1982年美国的经常收支项目出现91亿美元的逆差,1985年这项逆差已经高达1177亿美元,不得不依靠大量国际资本的流入来弥补。这样,1985年上半年美国就丧失了国际债权国的地位,转变为国际净债务国。至1985年底,美国所负的国际净债务已经高达1074亿美元,沦为当前最大的国际净债务国。1986年美国的净外债继续上升为2636亿美元,1987年更高达4240亿美元,据估计1988年美国的净外债将超过5000亿美元,至90年代初可能高达10000亿美元^①。

目前美国正处于结构调整过程中,它无疑需要经过一段艰苦的调整才能恢复经济竞争力。但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美国仍将是世界第一经济大国,1986年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高达42085亿美元,占世界比重的25.2%。同年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为19628亿美元,占世界比重的11.8%。美国仍将是世界资本主义的领导力量,因为美国的优势是综合性的,不仅是经济上的,还是军事上的,这就是所谓美元与核力量相结合的优势。但是,同样明显的是,美国经济竞争力无论怎样恢复都不能使它重新回到从前的顶峰。

1988年7月

(作者工作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① 见〔英〕《经济学家》1987年8月1—7日第177页。